

竞争性政党体制及左右政治的存在限制了政党的选择空间，形成一种新战略、新模式的难度加大，而选举政治下政党要赢得大选，势必需要回应选民各种个体的、短期的诉求，政党需要短期内见政绩，否则执政地位不稳。如政局稳定、经济繁荣，选举政治平稳运转，可显现竞争性政党体制的优势；但若政局动荡、社会冲突严重、经济不景气，则需要稳定的执政期、长期的规划、连续的政策，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计，而这正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缺陷之一。当前，欧洲面临的危机深重，走出危机需要时间，需要各方凝聚共识，这考验着欧洲政党和社会大众的智慧。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7.01.010

民粹主义与英国工党

李 宏

就观察目前正在席卷欧美的民粹主义及其对中左翼政党的影响而言，英国无疑是一个理想场所。欧债危机以来，英国进入多事之秋，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2015年大选，2016年更是因为脱欧公投并决定退出欧盟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瞩目的焦点。公投前夕，包括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论坛、英国工业联合会、富士350指数成分股企业及其他大型私营企业首席执行官、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主要经济学家、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七国集团领导人、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经济、金融和政治精英通过公开信、访谈、讲话等多种方式向脱欧阵营的民众发出脱欧将会引发英国经济、金融乃至社会震荡的预警。但所有努力并未奏效，沉默的大多数决定了脱欧公投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公投的主题是英国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这一主题关涉国家主权，其主要内容是反对欧洲一体化、反欧盟、反对一个更紧密联盟的愿景、反移民，反多元文化，要求国家控制自己的边界、金融财政、经济政治和外交，再国家化是其主要诉求。但与此并行的还有一条主线，即反精英、反执政党的财政紧缩政策和各项社会政策。有观察认为，脱欧投票产生的结果主要反映了工人阶级对政府、政治和政治家的愤怒和不满，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关注与工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就业、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等。这条主线反映了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在保守党财政紧缩政策下受益者与被损害者之间的对立。民众对公投的积极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自身权益被压制被损害的程度。平等和公正是这条主线的基本诉求。

实际上，早在脱欧公投导致民粹主义飙升之前，左翼民粹主义已在工党领袖选举中展现了自己的力量。2015年工党在大选中遭到进一步挫败，时任工党领袖的米利班德辞职。在选举新工党领袖的过程中，出现了被媒体称为“科尔宾狂热”

作者简介：李宏，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欧美主要国家执政党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研究”（16JJD710009）。

的现象。科尔宾出生于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25岁当选为北伦敦区议员，在30多年的议员生涯中，因其秉持“激进社会主义”理念不被工党主流认同而一直位列“后座议员”。此次参加工党领袖竞选也是涉险入围，仅比章程所要求的35票多1票。在与其他三位候选人——工党影子内阁的国务大臣、内政大臣和卫生大臣的竞选过程中，科尔宾对英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洞察，对保守党财政紧缩政策及其实质的猛烈抨击赢得了下层选民的共鸣，他反战、反资本主义、要求铁路及其他工业体系重新国有化、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大幅征税以补贴下层的主张深得广大基层选民的追捧和支持，并最终在工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59.5%得票率获得压倒性多数而当选为工党领袖。

尽管科尔宾被基层民众当作“工党灵魂真正守护者”而受到追捧，但被左翼民粹主义裹挟的工党在英国政治中的处境并不乐观。首先，工党的地位在英国政党格局的变动中持续走低。2015年大选是英国政党格局变化较大的一年，保守党、苏格兰民族党、英国独立党在大选中表现出色，工党和自由民主党遭遇惨败。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赢得330个议席，比2010年选举增加24个席位，组成了自1992年以来的首个多数党政府。苏格兰民族党强势崛起，获得该地区59个席位中的56席，一跃成为全国第三大政党。“单一议题政党”英国独立党在此次大选中虽然只获得1席，但实际得票率高达12.6%，影响不容小觑。主要反对党工党在英格兰遭到保守党重创，在苏格兰被民族党取代，在长期受经济不振影响的英格兰北部工业区遭遇英国独立党威胁。此次工党所获232个议席是自1987年以来最少的一次，比2010年大选减少26席，与保守党的议席差距从上届的48席扩大到98席。显然，工党不仅未能借此次大选恢复元气，反而遭到进一步挫败，在政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其次，主流民意对工党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2008年以来，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下，英国经济增长乏力，如何振兴经济、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确保经济安全是英国各主要政党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010年，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内阁，厉行财政紧缩政策，经过五年治理，联合政府在消除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截止2015年大选前，英国“在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增长最快，比德国快75%，三倍于欧元区，七倍于法国”，“财政赤字减半，日均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欧盟其他国家的就业总和”^①。凭借振兴经济的成绩单，保守党在2015年大选获得决定性多数并单独组阁。与保守党在经济方面的业绩相比，工党在米利班德时期就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经济振兴方案，其主要思路仍然是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科尔宾继任以后，在左翼民粹主义的支持下继续左转，主张“更公平的税收”，对富人增税，认为“那些拥有最多财富的，应该交最多的税”以补贴穷人。科尔宾的主张引发了中上阶层的恐慌。据“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BSA）数据显示：在“谁能振兴英国工业”的选项中，有35%的选民支持保守党

^① [英] 戴维·卡梅伦 《英国保守党2015年竞选纲领》，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3期。

政府，支持工党的为25%；在税收方面，希望维持现状者高达52%，要求增加税收以提高公共服务开支者为37%；在“谁能保持英国经济持续繁荣”选项中，支持保守党政府的民众占39%，支持工党的仅为18%，保守党大幅领先工党^①。上述数据表明，民众对工党在振兴经济、减少赤字、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收入、保持未来经济繁荣等方面的能力并不看好。其三，工党在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面临其他政党的强势竞争。一般而言，选民对工党在建立更公平社会、维护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及改善公立学校质量方面抱有更大信心，在这三项上工党所获得的支持率分别高于保守党12、27和10个百分点。但工党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自己的传统优势正在被保守党和独立党吸纳或替代。在过去，工党向其选民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坚信福利和公共服务能够为您和您的家庭提供保障。而现今，保守党向选民表达的信息是：我们不仅为您和您的家庭提供保障，还会节省开支，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为您留下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资金。保守党的理念和做法迎合了大多数中上层民众在经济缓慢复苏境况中希望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来维持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诉求，更具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工党则因其主张被其他政党吸纳而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间选民流失^②。对于欧盟，工党的基本态度是在保留成员国身份的前提下促使欧盟进行有利于英国的改革，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支持统一大市场，反对一个更紧密的联盟。这与保守党留欧派的诉求几无二致，且不如保守党的主张激进和具体。在移民方面，工党虽然也有对移民进行管控的诉求，但同时要求实施“更人性化、更有效的移民规则”，“要防止对移民工人的剥削”^③。工党相对温和包容的态度与选民、包括工党选民对移民的强烈排斥形成反差，其间的差距，又为“单一议题政党”英国独立党的侵入提供了契机。

工党当前的困境是多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持续侵蚀工党的社会基础。20世纪70年代，工党4/5的选票来自工人阶级，不到1/5来自中产阶级。而现在英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数量之比大约是4:3，工党选民中的中坚力量不断萎缩。其次，选民投票行为发生变化。与工人阶级不同的是中间选民在选举时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度大幅降低，中间选民评判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家所依据的不再是政党的意识形态或宣言而是他们是否具备执政品质：比如这个党或党的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引领英国走出危机，是否能提振经济、是否能解决民众的切身利益关切等等，对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工党持续左转导致中间选民的疏离。2010年大选失利以后，工党开始放弃布莱尔倡导的中间道路向传统价值回归。2015年再度失利后，激进左翼科尔宾成为领袖，工党在米利班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左转。虽然科尔宾的支持者将其当做工党灵魂的守护者，但主流媒体却将其视为“有史以来最左的领导者”，是“一条活在80年代的政坛恐龙”。科尔宾所持有的激进立场和观点，不仅造成了其支持者与工党选民之间的张力，而且加剧

① Peter Kellner,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pth of Labour's Crisi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Jan, 2017.

② Peter Kellner,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epth of Labour's Crisi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Jan, 2017.

③ [英]戴维·卡梅伦《英国工党2015年竞选宣言》，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3期。

了与普通选民的疏离。就目前来看,被左翼民粹主义裹挟的英国工党处于两难境地:秉承布莱尔路线,或将难保工党特性,引发认同危机,导致部分选民进一步流失;如继续科尔宾路线,回归工党传统价值,虽能吸引蓝领、体力劳动者或依靠政府救济生活的群体,但其激进立场及主张会引发主流民意恐慌,从而丧失再次执政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前提下,吸引更多选民,避免在政党竞争的格局中被边缘化,避免从反对党沦为抗议党是工党在民粹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7.01.011

欧洲多重危机背景下的激进左翼政党

王聪聪

极右翼政党的“逆袭”和民粹主义的重新崛起,已成为当前欧洲政坛最显著的特征。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奥地利总统大选中自由党候选人诺贝特·霍费尔的高支持率、德国选择党在2016年地方选举中的不断突破、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和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进入全国议会,都清楚表明,极右翼政党正强烈冲击着欧洲政坛。而在法国,最新民调纷纷显示,极右翼民族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的领先优势增强,而另一位中右翼的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也被媒体称为“经济和社会议题上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相对于传统右翼政党而言,极右翼的政策主张更加偏激和极端,它们排斥和仇视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社会多元化,通常通过煽动民众情绪来对抗“精英政治”。

民粹主义在欧洲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使民众对传统政治的“精英主义”感到失望,转而支持激进政党,特别是极右翼政党。始于2008年的欧洲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不仅使得大部分国家的现任政府遭到惩罚,更严重侵蚀了传统的政治生态,导致政党体系的剧变(意大利和爱尔兰)或崩溃(希腊)。民粹主义的重新兴起挑战着代议制民主,由于传统主流政党无法有效回应“全球化失意者”,以及经济社会层面的新兴议题,极右翼政党通过宣扬“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分野,特别是二者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来博取民众的支持。作为民主的阴影,民粹主义者将自己视为真正的民主代表,倡导字面意义上的“人民的政府”,拒绝自由的制衡,实际上其意识形态是非常狭隘的民主^①。

在许多欧洲国家,极右翼政党成为激进左翼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竞争者,例如在德国梅前州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20.8%的选票,而左翼党只获得了13.2%的选票。德国选择党不仅和左翼党争夺潜在选民,也在模仿和

作者简介:王聪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100191)。

^① Hanspeter Kriesi and Takis S. Pappas (eds.),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Cheltenham: ECPR Press, 2015), pp. 1-5.